
農民的話語權問題 —— 用話語分析的方法透視

楊慧瓊

摘要

本文採用話語分析方法，使用樊·迪克的文本超結構理論和語用學中的言有所為原理，以進城務工者和市民為參照群體、農民群體為中心群體，通過分析三個群體的新聞話語的超結構、超結構特點、服務資訊中的聲音和政策類新聞，得出結論：農民在新聞話語裏沒有說甚麼，不是完成言語行為的主體；同時也沒有被恰當地談論；農民「他」不被考慮為是「對話」的物件。整體來看，新聞話語表現出來的新聞主體(媒介)和農民群體之間的關係不僅是單向的，而且彼此疏離。這種單向而疏離的關係直接源於擁有書寫權力的媒介對農民群體的忽視，間接源於兩種社會語境：體制內的宣傳者和市場經濟下的盈利者。

關鍵詞：農民、話語分析、話語權、農民工

楊慧瓊，現為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2006年蘭州大學新聞學碩士。主要研究興趣為傳播和現實中國社會的互動關係，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電郵：yanghq@yahoo.cn

An Analysis of Chinese News Discourse on Farmers

Bodhi YOUNG

Abstract

Following T. van Dijk's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ese news discourse on farmers and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farmers and migrant workers are excluded from "dialogues" in news media communication. As a result, these groups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the news media, negatively affecting their relationship to urban dwelling news audiences, either as subjects or objects of the new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consequences stem from the news media's roles in both propagation of official perspectives and in the communications market economy.

Keywords: farmers, discourse analysis, right of expression, migrant workers

話語權在中國大陸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概念。熱到甚麼地步？在中國大陸百度搜索引擎中鍵入「話語權」，能得到相關網頁約3,560,000篇，¹而在搜索結果的第一頁所分列的網頁所說的話語權是在說誰的話語權呢？博客的、財經媒體的國際報導、汽車的、茶葉的、家居品牌的、股市中機構的、教育PC的。這一葉之秋表現與學術界的關注有一種一致的脈絡。無論國際文化傳播，還是國際政治傳播，或者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或者網路社群、政治、法律、傳播學、社會學在論述某一集團或群體的話語權，與百度搜索出來的在各個行業書寫中成為濫觴的話語權在概念的理解上，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現在讓我們看看這種共識。

話語：我們和媒介的一種關係

一句流行之語是「話語即權力」，這暗示了人們的共識來自於福柯的「話語權力論」。人們對「話語權」一詞的使用，要麼沒有任何內涵上的界定；(周海濤，2004；吳曉明，2004；廖藝萍，2006；曹國聖，2006；袁三標，2006；張姍，2006；王豔平、劉妙妙，2007；張蘭，2006；譚學純、趙莉，2006；陳敏直，2006；張明靖，2006；魏敏鋼，2006；王曉朋，2006)；要麼沒有提及福柯直接界定為公民或受眾的政治民主權利(李勤、丁潔，2004；高榕，2005；郝澄，2005；張帆，2006；闕祥才、桂勝，2007)；第三種情形，首先把發出聲音的表達權利作為「話語權」的內涵(祝敏青，2005；柴靜，2006；李敬波，2007；劉志順，2007)都引用了某個觀點而作為話語權的內涵的是第四種情形，一是引用「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衛夙瑾，2004；周春霞，2005；祁媛、高劍甯、梁蘭，2006；丁末，2006；王慧星、李克欽，2007)；再就是引用了福柯話語生產的程式觀點(李瑋慧，2006)和話語生產受到控制的觀點(傅俊、韓媛媛，2006；吳衛華，2006)；第五，話語權的內涵界定權利和權力兩個面(祁林，2003；李東升、姜曉寧，2006)。在這種混亂局面之下人們對福柯理論的某些主觀解讀各有廣泛認可的範圍。除了第一種情形迴避了何謂話語權的問題，其他情形「話語權」的所謂「話語」，和福柯所採用的「話語」在含義上不是一碼事，但又並

非毫無聯繫。在他的著作裏，與後來話語分析理論的「話語」接近的是「陳述」一詞。(Fairclough, 1992, 殷曉蓉譯, 2003) 在我看來，福柯對於知識——權力的關注，對於「話語」一詞的頻繁使用，是從《規訓與懲罰》開始的。(Foucault, 1975, 劉北成、楊遠櫻譯, 1998) 在《規訓與懲罰》裏，他對「話語」的使用，還是建立在學科的內涵上，即作為知識領域的各種客體在懲罰實踐中的運用。福柯的確注意到了作為客體的知識如何被權力製造，又助長了權力，並被各種權威應用了一種社會實踐中對社會中的特殊群體進行規訓。這背後隱藏的是人和人的關係，是知識的使用(話語實踐)和社會的關係，文本作為知識——權力的一種載體，可以發展成為一部分人規訓另一部分人的書寫權力。(Foucault, 1975, 劉北成、楊遠櫻譯, 1998) 從這個意義上看，福柯所謂話語，是一種運用知識——權力的社會實踐形式。在福柯所考察的「程式」中，包括有關誰能夠說甚麼的限制，由誰說的限制，在甚麼場合的限制；理性的話語和瘋狂的話語之間的對立，真實的話語和虛假的話語之間的對立；原創者的歸屬作用，學科間的界限，歸屬於某些文本的宗教地位；進入某些話語實踐的社會限制——福柯在這種聯繫中注意到了「任何教育體系都是維持或修正話語佔用的一種政治手段，連同話語所承載的知識和權力」。當我們把眼光從福柯的認識客體轉向社會生活中的客體時(Fairclough, 1992, 殷曉蓉譯, 2003)，福柯對程式的論述的確暗含了權利和權力在人群中的分佈。換句話說，它暗含了人和人、人和各種權威之間的關係。對於擁有書寫權力的新聞媒體來說，對於普通人來說，它一直是力量強大的，它是弗洛姆所說的匿名的權威(Fromm, 1941, 陳學明譯, 1987)。一類人在新聞報導中的地位，反映了這類人和媒介的關係。新聞話語，實際上是我們和媒介的一種關係。以此為理論基礎，在這裏，我關注中國農民在新聞話語中的位置，努力弄清楚一些基本的現實問題：這類人會被新聞主體(機構和機構中的個人)如何描述？這類人在新聞話語中能夠說甚麼？如果他們沒有說甚麼，那麼他們被誰在說？也就是說本文只對「話語」的一部分程式感興趣，而這部分程式的確和權利、權力相關。其實，考據大陸甚麼時候開始有了「話語權」一詞以及這個虛構的觀念到底在人們的理解上如何達成一個共識以便獲得便於操作的定義，這種實證主義的思路並非獲取真實的唯一道路。鑒於福柯對社會變化的關注，話語權

的概念也許可能非常複雜，而我的研究目的只在探索性的，我只是為了：一、滿足個人的好奇心和對這個議題欲深入瞭解的欲望；二、探討對這一議題進行細緻研究的可行性；三、發展後續研究中需要使用的方法。作為一次探索性研究，可以為獲得和尋求確切答案的研究方法提供線索，但是，並不提供確切的答案。

中心群體和參照群體的選擇

作為一種現實的印象，人們普遍認為農民在媒介中是失語的，而且他們不但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其話語還被主流話語或者精英話語所掩蓋。實際上傳播學界對於弱勢群體尤其是民工的關注比較多，對於農民關注得很少，而社會學界是從更廣泛的視野中去關注的。對於民工在新聞報導和媒介中的位置，偶有個案研究或一定規模樣本的內容分析面世，關於農民的都是印象化的描述和情緒化的論述。為了回答個人的疑問，必須運用一種功能強大的方法，在和其他群體的比較中確定農民在新聞話語中實際的位置。市民和進城務工者被選擇作為參照群體。下面對中心群體和參照群體的選擇作簡單交代。

為甚麼選擇農民群體和市民和進城務工者兩類參照群體？因為中國農民群體的社會地位在歷史變遷中耐人尋味。首先考慮建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制度變遷。1949年建國後，在短短7年時間裏，中央政府發動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運動，顛倒了以社會財富和威望作為社會分層的標準，引入了一個新的標準：意識形態。這樣，平等的社會似乎就出現了。實際上，當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分層的絕對標準存在時，新的不平等已然隨之存在。此後，1963年，從農村自由遷徙到城市的人口已被稱之為「黑人黑戶」，從此，農村人口不僅成了「二等公民」，而且流向城市的管道被堵塞，社會分層體系又引入一個新的參數：城鄉戶籍。1956-1976年，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階級成分劃定後的意識形態身份標籤被制度化的與利益分配制度掛鉤並層層執行（一個人的工資級別、福利待遇與階級成分掛鉤），另一方面在農村和城市執行著有天淵之別的工資制度、福利保障制度。不平等的社會型資源的分配格局和社會性資源的分配機制凝固了，一系列的制度失範卻同時還在起起伏伏。大致到1983年

底，1949–1976年間由制度安排和制度失範所劃分的歧視性社會等級被終結，中國社會分層機制開始轉向另一個機制(邱澤奇，2004)。² 1983年到現在，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20多年了，中國社會是否形成了與1976年完全不同的社會分層結構呢？社會學界內部也難達一致。³ 拿「進城農民」來說，人們發現這個群體很難歸類到哪個階層。有的將他們歸為「產業工人階層」，但很多「民工」當著個體戶，還有很多開著小企業；甚至有一些是公司的管理者，因之都是「農村人口」，而一律將他們稱之為「民工」；有的將「民工」一個群體單獨看待；有的還是站在農民階層的立場上，將「民工」作為農民階層的一個群體來對待，但從職業上看，他們和真正的「農民」完全是兩碼事。舊的社會分層體系中的各個階層內部出現了分化，但變化的方向很難確定；同時，舊體制的遺產還在發揮作用。對於農民來說，土地承包到戶制度分，鄉鎮企業和20世紀90年代被取消的城鎮物資供應體系在縮小城鄉差距上並沒表現出巨大的力量，因為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的存在，農村和城鎮在體制框架上仍然是兩個世界。制度的效用在一定的條件下往往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城鄉戶籍尚未消除的前提下，把城鎮和鄉村作為兩個社會群體類別來分析還是有意義的(邱澤奇，2004)。自1992年糧食賣難以來，一方面大量農民湧入了城市，另一方面，實際上農村和農民被中國的主流社會和社會中心日益疏離的步伐和狀況並沒有停止。這點從每年的「五一」和「十一」黃金周的新聞報導是可以印證的。兩個黃金周在中國農村，就我所知兩湖一帶，「五一」是農忙開始，「十一」正處於農忙之中，而兩個黃金周的新聞報導大多是關於黃金周旅遊和如何在城市裏過黃金周的，農忙沒有和中國主流生活和媒介發生甚麼關係，城市和農村依然是兩個世界。

至於1992年以來引起城市人重視的「民工潮」，讓進城務工者的身份在社會語境中得到了認可和確立。他們的特殊之處在於兼之「農民」的身份和「工人」的職業，和農民一樣，都處在社會職業分層的下端(李強，1993)。他們都是農村人口，他們的根都在鄉村。這兩大群體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天然的聯繫；另一方面，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收入、利益分配在本質上和市民的生活是一致的，客觀上似乎要融合「農村戶口」和「城市人」的二元對立。他們身份上的一片灰色讓他們是理想的「農民」和「市民」之間的中間群體。

而市民群體，他們是大多數商業利益的角逐對象，這中間也包括了媒介。他們在媒介中的位置是否因為他們利益上的重要性而與農民和進城務工者不同呢？這種不同怎麼得到表現的？他們獨特的位置從另一個角度幫助農民在媒介中確定了一種甚麼樣的位置？作為城鄉二元結構對立的長期受益者，談到農民的位置，自然也需要確定市民的位置。

方法基礎

作為一種方法和學科，話語分析發展的歷史從1952年哈里斯發表“Discourse Analysis”（話語分析）這篇論文為開端（朱永生，2003）。一直以來，誕生於符號學的話語分析的研究物件始終是語言。為了研究語言，話語分析可以和內容分析一樣，研究一切語言的表現形式字、詞、句子、段落、文章和文章的集合，無論口頭的還是書面的。所以，樊·迪克稱自己所提出的方法是要有助於建立一種新的、更清楚的媒體內容資訊分析（樊·迪克，1988，曾慶香譯，2003）。實際上，話語分析首先分析的是文本，是一種語言使用，是說出來的和寫出來的。

既然是一種社會的使用行為，它更需要關注的是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或者說語言所體現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在福柯的理論影響下，費爾克拉夫致力於將福柯的理論引入到以文本為方向的話語分析理論中。這種理論雖然以口頭的和文本的語言為研究重點，但是又把話語當作一種社會實踐的形式。這意味著話語既是一種表現形式，也是行為方式；話語和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一種辨證關係，即一種實踐和社會結構之間有因果關係（Fairclough, 1992，殷曉蓉譯，2003）。而提出了另一種話語分析方法的樊·迪克1988年在《作為話語的新聞裏》一書中，予以強調的是對新聞文本的話語分析，是為了弄清楚文本和語境之間的關係，具體說「要對話語進行全面有效的描述也必須丟話語的產生和理解、社會文化情境中社會互動行為的認知過程進行描述」，對新聞文本和語境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是要弄清楚「認知過程是如何確切地影響話語結構的產生和理解，話語結構又是如何影響社會情景和怎麼受社會情景影響的」。我們可以看到，樊·迪克和費爾克拉夫的不同表述之下，暗含了一種聯繫，即話語分析分析話語的最終目的在於回答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與費爾克拉夫不同的是，儘管方法理論都是綜合的跨學科的，儘管都認為要回答更為廣闊的話語行為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樊·迪克把精力放在了一種話語類型上——他稱之為新聞話語的文類，他主要運用可以靈活拆卸的結構去分析文本、文本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情景以及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本文主要運用他的文本超結構理論，兼之話語分析通常使用的語用學分析。

樊·迪克提出的文本超結構理論

主要基於認知心理學和語言學，樊·迪克提出了新聞話語的結構理論(樊·迪克，1988，曾慶香譯，2003)。一則新聞在製作上，核心詞，主要是句子的謂語動詞，加上其他的中間項，構成命題P。從多個命題的集合中，運用巨集觀規則，可以推導出一篇文本的主題M(一段話或文章、或者小說的中心話題)。在微觀結構上，命題P都能夠歸類到新聞圖式範疇裏，新聞圖式範疇按照一定的排序規則和策略，在具體的新聞文本中找到它的骨架，構成特定文本的結構，這就是樊·迪克的主題結構和新聞圖式理論，也可以說是新聞在文本視角上的結構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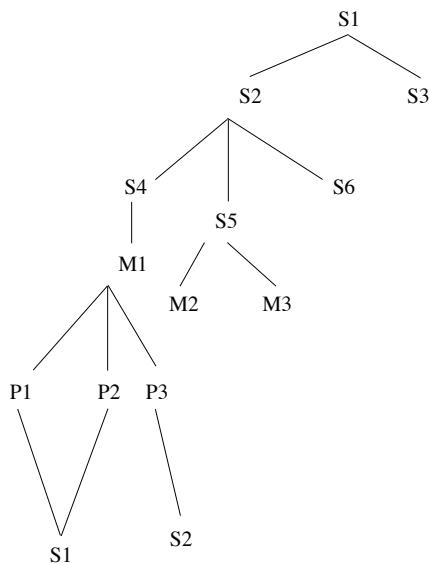
但是，一個文本不僅通過某一方式和其他的文本發生聯繫，而且一種類型的文本在整體上也和另一種類型的文本發生著聯繫。不同的文類有不同的圖式，故事是一種敘述圖式，學術文章和演講辭採用了論證圖式，日常會話的圖式和這兩種又不同，等等。樊·迪克認為，在文類不同的圖式結構中，應該發展出一種超結構理論，這一超結構不僅可以描述不同的文類圖式的一般性分類、規則和局限性，還可以對圖式和其他話語的結構，如總體、主題結構和文本的局部結構等是如何連接的作出解釋。也就是說，一篇新聞的主題M在語義上還可以歸納到更高層次的宏觀主題S(即超結構範疇)。宏觀主題S在語義上，同樣在宏觀規則的作用下，還可以有等級的歸屬到一個最高層次的宏觀主題S。命題P、主題(語義巨集觀結構的巨集觀命題)M和超結構S整體上構成了一個有序的句子群體。樊·迪克稱超結構是話語的綜合性、全局性結構。儘管他只提出了一個抽象的示意圖，但是在描述同一文類的不同文本如何通過命題、宏觀主題和超結構連接成一個更大的超結構方面，是非常理想的模

式。樊·迪克用S1, S2……等代表超結構範疇，M1, M2……等代表宏觀結構範疇；P1, P2代表命題，並且假設整個超結構範疇只有一個超結構的宏觀命題。這個圖式見圖一。

雖然樊·迪克提出這一假想的目的是在於勾勒不同文類之間的語義聯繫，但是，筆者認為，這一假想模式首先是在同一文類中起作用的。畢竟，能夠稱得上樊·迪克所說的「新聞故事」的報導只佔新聞資訊中的一部分，在新聞這個文類的內部，還有一些亞文類，如非事件性消息、時效性相對較弱的深度報導、社論等等，它們之間通過主題的關聯存在著一種次級分類之間的語義聯繫。

因此，一則新聞話語，在宏觀命題上，可以屬於這一個宏觀結構，也通過文本結構上的命題，屬於另一個宏觀結構。這些宏觀結構之間的關係，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可以是一個文類的超結構，也將和其他文類構成更大的超結構。超結構理論能夠幫助我們全面的看待不同群體的新聞話語的主題內容的構成。

圖一 圖式超結構和其他文本結構聯繫示意圖



言有所為

漢語是表意體系的文字，以義取部，從義歸類。有一些詞在傳播過程中是「實行式話語」的詞，它們一般是「言」旁、「口」旁、「目」旁和「豎心」旁的動詞。這些詞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相連，直接證明這個人或某個群體在媒介上說了甚麼。針對新聞標題而言，一旦新聞標題清楚地表明誰說了甚麼，實際上就是這個人(採訪物件，新聞人物)完成了某種行為，是實行式話語，如發出呼籲、發出警告、發佈命令、提出建議、作出承諾等等(李彬，2003)。這種語用學的視角有助於揭示在一種社會和文化情景下完成的社會行為。換言之，某個人或某個群體在媒體上說了話、發出了他(們)的聲音，這個行為本身是整篇新聞通過新聞標題向讀者傳播的第一個基本資訊。

樣本和分析單位說明

樣本選擇

分析物件通過百度對新聞報道進行等距抽樣，2005年1月-6月半年中每10天抽取一天的新聞報道。這種抽樣方式忽略了作為百度新聞來源的各類媒體的屬性，在本文中對這些屬性也不作變數的考慮，這是本文的研究思路決定的。對於農民群體在新聞話語中的話語權，局部分析，如分析一個新聞事件、分析一家媒體或兩類媒體的某些欄目，不能滿足個人的興趣，這裏要尋求的是對模糊了媒體屬性的總體狀況的瞭解。⁴ 作為中國大陸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的資訊來源體現了多元化，以新聞為例，它涵蓋了黨報、都市報、財經類報紙、時政類報紙、電視台、期刊、博客、論壇、各類刊登新聞的官方或民間的網站。這是直接觀察得到的。要弄清楚一個群體在新聞話語中的位置，沒有甚麼比使用一個方便的多元化的搜索引擎來獲取資料更強大和方便的了。由於無法獲取百度新聞業務和全國媒體的資料，導致用搜索引擎抽樣在抽樣框上讓研究者進行主觀的界定時有些模糊，但是它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能夠在大樣本範圍裏幫助弄明白一種現實的資料來源。而且，我個人認為，這種抽樣能說明全國媒介的情況。通過百度的搜索引擎，搜索範圍限定在新聞標

題，以「標題包含」的方式抽取具體的某一天如2005年2月1日，搜索出標題裏出現有下列命名的所有新聞：(1)「民工」、「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打工者/打工青年」、「進城務工人員/外來務工人員」；(2)「農民」；(3)「市民」。其中(1)和(2)是農村戶籍，(3)是城市戶籍。

樣本整理

對抽取的樣本進行必要的處理，這些處理包括刪掉：新聞標題一模一樣的新聞話語，新聞評論，BBS帖子，政府和企業網站自行採集和發佈的資訊(不是報紙、電視台和廣播生產的)，與分析主題完全無關的文本，共取得樣本3,905條。樣本分佈情況見表一。

表一 市民和農村戶口群體的新聞話語樣本分佈表

日期/群體	城市戶口者		農村戶口者		統計
	市民	進城務工人員	農民		
1月2日	92	23	33	148	
1月12日	135	84	135	354	
1月22日	61	50	40	151	
2月1日	127	96	134	357	
2月11日	38	12	20	70	
2月21日	128	123	137	388	
3月3日	78	72	101	251	
3月13日	67	40	46	153	
3月23日	132	40	120	292	
4月2日	55	53	42	150	
4月12日	123	19	112	254	
4月22日	106	59	106	271	
4月2日	78	41	35	154	
5月12日	99	39	116	254	
5月22日	46	32	30	108	
6月1日	108	27	88	223	
6月11日	49	25	36	110	
6月21日	106	28	83	217	
統計	1,628	863	1,414	3,905	

分析單位

主要的分析單位是新聞資訊的標題。這種限定基於樊·迪克的一個觀點：新聞話語的主題經常以標題的形式表現出來，起著概述的功效。也就是說，一篇新聞的標題在宏觀結構上，是它的宏觀主題。這實際上源於標題在新聞生產中獨特的地位和功能。標題要揭示出正文裏最核心的最有新聞價值的事實。一個趕時間的人在閱讀一份報紙時，流覽標題就可知天下事了，一個沒有讀報習慣的人聽報童的叫賣就知道發生了哪些大事了。標題往往是文章主題最簡明、最有力、最好的體現。事實概括出來，就形成了標題；標題是最短的新聞。是源於新聞、代表新聞、揭示新聞的主要內容，是精練了、集中了的新聞資訊內容；標題是新聞的「眼睛」，是一組文章的綱領(蔣欽揮，1999)。

分析一：農民的新聞話語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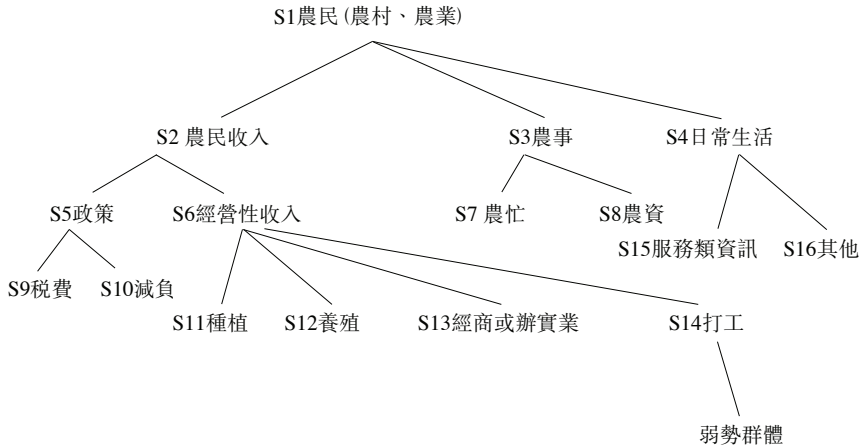
由於語義關係，不同文類在結構上，宏觀命題最後形成一個超結構。由於命題和文本主題層次上太過龐大，這裏運用超結構理論時，只將一個群體的新聞話語的超結構排列到宏觀主題S，命題P和主題M在圖示中不予說明。

三個群體的新聞話語的文本超結構

3,905個樣本中，首先分析農民的新聞報道。通過精讀1,414個農民新聞的標題，農民的新聞話語的文本超結構可以描述如圖二。

在圖二中，農民的新聞話語裏，所有的新聞報道在更高的層次上都可在樹形圖上找到一個位置。具體來說，農民的新聞話語在高於文本主題，即具體一個篇報道說了甚麼的更高層次上，可以歸屬到：稅費、減負、種植、養殖、經商或辦實業、打工。這些宏觀主題再往上走，可以歸納到農村政策和經營性收入，接著，這兩個宏觀主題歸屬於農民收入問題。農民收入和農事一起，歸屬到農民這個更高一級的農民這個宏觀超結構。而在次級宏觀命題「打工」問題上，這個超結構和弱勢群體關聯

圖二 農民的新聞話語的文本超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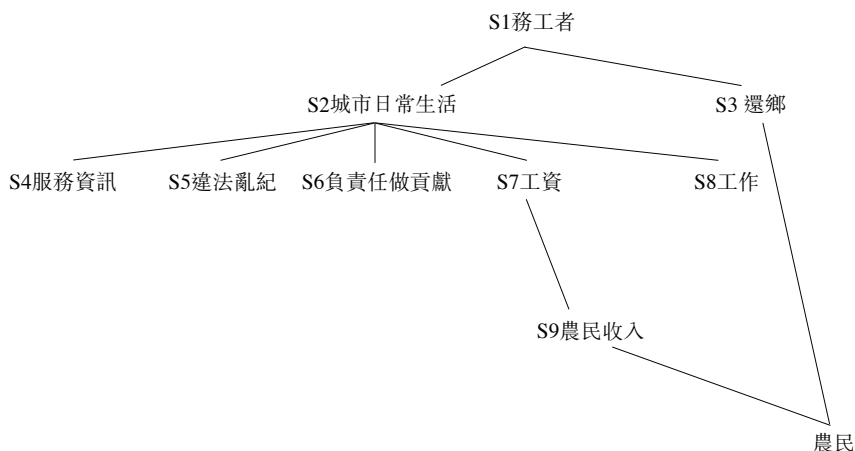
到一起，在全局意義上和民工報道、工人報道和市民的新聞話語上在結構上聯繫到一起。

圖二中出現的宏觀命題裏，其中為報道重點的是農民收入，其實是農事，最後是農民的日常生活。它們的共同特徵在於，(1) 新聞標題中，作為話語焦點和語義重點(馬慶株，1999)出現的，是某個地方、某個政府、政府部門，而不是農民。(2) 唯一的例外是在「農民的日常生活」這一宏觀命題下的新聞標題，但是作為成為語義重點和話語焦點的，新聞不僅少而且所提供資訊並不方便農民取之即用。(3) 由於不是語義的重點，在語義上，整體來說，農民的新聞話語的宏觀主題是政府的農村、農業工作成績和農業政策的實際效果，而不是農民。

進城打工者的報道與農民群體的報道類似，但是又體現出不同的特點。我們梳理出進城打工者報道的文本超結構(圖三)。

在進城打工者的報道中，整體上的話語結構表現出四個特點：(1) 回家的主題，拿工資的主題，以及相關的子女教育問題，作為語義重點和話語焦點出現的是相關的部門和組織，是某個地方政府，法院、勞動部門、公安部門和鐵路航空部門，都不是打工者。(2) 在新聞標題裏，他們作為群體，往往作為行動的受事而出現。(3) 當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作為個體而出現時，作為行動的受事，往往遭遇了不幸，作為行動的施事，往

圖三 務工者的新聞話語的文本超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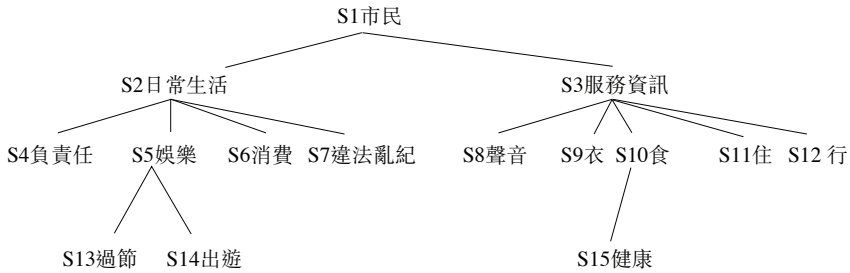
往妨害了社會和他人，或者作出了可笑的事情。(4) 針對這一特殊群體的服務資訊，對比農民來說，要多一些，但是類似的是，新聞並不方便務工者取之即用。

最後分析一下市民群體的新聞話語在整體結構上表現出來的特徵(圖四)。

關於市民的新聞話語的明顯不同在於，媒介要通過新聞獲取他們的支援是它們的傳播意圖。因此，圍繞市民服務，貼近他們的生活，成為市民新聞話語的內容特色。所以在整體上，市民的新聞話語表現出和農民和進城打工者完全不同的特徵。首先，(1) 市民是作為語義重點和話語焦點出現的。(2) 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市民的形象是負責任的，積極參與社會的各個方面。(3) 作為一個整體，媒介關注市民的休閒娛樂、節假日、消費。(4) 服務資訊面面俱到。在這一宏觀命題下，關乎市民出行、日常穿衣冷暖、健康、理財、住房家居、停水停電，媒體都善意地提醒、告誡、通知，市民期望甚麼、煩惱甚麼、質疑甚麼、感謝甚麼，他們的呼籲、建議和願望、要求，在新聞話語中總在標題中出現。這是一種互動的對話的模式。總而言之，市民在媒介上有他們的聲音，與切身利益相關的大小事情，市民都能利用媒介產生傳播影響。

總之，三個群體在超結構上表現出明顯的不同。

圖四 市民群體的新聞話語的文本超結構



- 1、佔主導地位的宏觀主題不同。人口最多的農民群體的新聞話語在超結構上，服務資訊作為一個宏觀主題，文本最少，相反，市民群體的新聞話語超結構裏，服務資訊是佔主導的宏觀主題。這類資訊的最大特點就是可以導致受眾閱讀資訊之後有所行動，即對人的生活有幫助。在新聞標題上，這類新聞一是媒介主動關懷這一群體，對可能引起麻煩的問題予以提醒、告誡、通知、預報；二是人們在媒體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媒介上三個群體的「聲音」對比，將在後面專門分析。
- 2、儘管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農民和務工者承擔了更大的責任，但是日常生活，包括消費、娛樂、過節、公民的社會責任表現，在市民群體中是一個主導地位的宏觀命題，相反，農民和務工者群體的新聞話語裏，都是非常次要的。
- 3、市民群體在新聞標題中佔據的都是語義重點和注意焦點的位置，他們的聲音能夠及時的在媒介的版面和空間中佔據一大塊地方。農民群體和務工者群體類似，有關他們的新聞話語中佔主導地位的宏觀命題在表述上，這兩大群體不是新聞標題的語義重點和注意焦點，佔據這個主體位置的是政府及其部門、行政區域和一些企業。換句話說，他們甚麼都沒有說，說話的不是他們。
- 4、在結構上的上述特點，導致不同群體的新聞話語在傳播模式上，從能否互動上來看，市民群體的是一種對話的模式，而農民群體的新聞話語是單向的宣傳色彩濃厚的模式，務工者群體與農民群體的模式相仿。

- 5、農民群體在新聞話語中並沒有說甚麼，也沒有被新聞主體恰當地談論，與市民對比，他們在新聞話語中的位置是重要——次要、重視——疏離的，市民、農民和媒介之間的關係是互動——單向的。務工者群體的與農民群體的相仿。

分析二：聲音

模式總體上的語義特徵不僅會在模式的外部和整體上，而且會在更細微的地方，在文本超結構的某個層次，再深入下去，在一篇篇文本結構的某個支點，體現出來。當某個特徵成為普遍的，隨處可見的現象時，一種本質性的東西出現了，從最細微最深處發散到外部，成為總體的特徵。反過來，要分析它，必須深入到內部最細微的地方。這裏運用語用學的基本知識分析農民、進城務工者和市民在新聞話語中的言說行為，新聞標題裏直接表示語言行為的那一部分被找了出來，可將之稱之為「聲音」。

如前所述，這一部分被筆者歸為服務資訊，在詞形上，它們是那些表示說話、思想、意願和動作的詞，在語義特徵上，它們是(1)反應一個人的願望、要求和關心。這些辭彙在新聞標題裏被選擇了：期待、期盼、企盼、盼望、熱盼、呼籲、疾呼、關心、關注、放心、願望、想、擔心、憂。(2)反應人們的意見，新聞標題裏出現的有：建言、建議、熱議、評議、討論、投訴、質疑、懷疑、置疑、諮詢、不解、不滿、反感、反對、支援。(3)作為互動出現的，公共事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對市民生活各方面作的斷言，所能見到的辭彙有：提醒、告誡、小心、當心、謹防、慎對、謹慎、提防、不必、不要、莫、要、應當、保證、保障。這些詞也可以不出現，但是整個句子充當了提醒的功能，比如，省城太原市民注意：省城部分街道小區要停電(太原新聞網，2005年6月1日，09:49)。(4)對一個群體的某個人言論的引用，包括直接引用和間接引用。總的來說，樣本總體裏，服務資訊在三個群體的分佈情況是不同的(見表二)。

農民群體的服務資訊最少，佔農民新聞樣本的4.67%，接下來是務工者群體，佔它的新聞話語的25.47%，最多的是市民，佔到了34.09%。不過，這還不能說明三個群體聲音對比。

在基本的辭彙和語義的指導下，根據研究的物件，那些作為某個群

體的代言人的引述(官員說的，人大代表說的，社會團體發言人說的)，一律排除，一些媒體主動作為某個群體代言人的言論，也一律排除。統計後，服務資訊中，我稱之為「聲音」的新聞話語分佈見表三。

來自表三中第3類的資料向我們揭示，市民群體的聲音在媒介話語裏，發揮地最全面，姿態是主動的、積極的社會事務參與者，農民群體和務工者群體，媒介話語構建了一種他們從來沒有不是社會事務的參與者。1和2兩個類別的資料能夠說明，市民群體同時也是政府部門、經濟組織尋求對話的群體；至於媒介是否充當了政府、經濟組織和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對話論壇，從第1類和第2類的資料上看，等同於安慰。這兩點從另一個緯度印證了農民群體和務工者群體在新聞話語裏的被動位置。將1、3和5三個類別合計在一起，作為群體言論；將第2類別單另計，作為政府和經濟組織尋求互動的對話，表三生成了表四。

表二 不同群體的服務資訊分佈情況

群體/服務資訊比例	新聞總量	服務資訊	百分比
農民	1,414	66	4.67%
務工者	852	217	25.47%
市民	1,628	555	34.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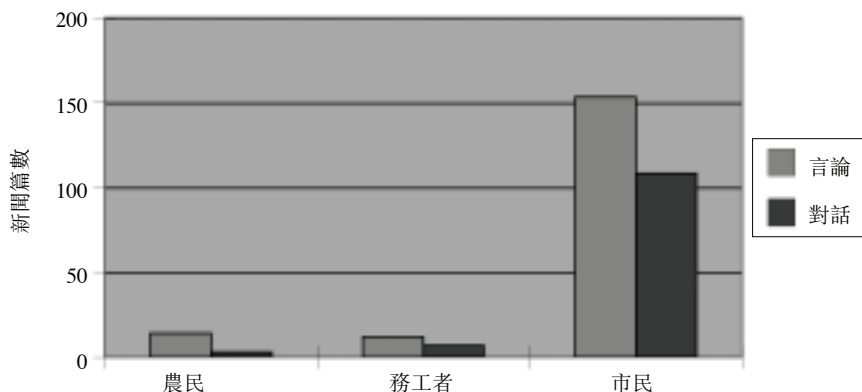
表三 服務資訊中互動和對話的分佈

群體	務工者	農民	市民
聲音			
服務資訊	217	66	555
1、關心/盼、望、願、想	5	11	49
2、提醒/保證	7	3	108
3、議、評、疑	0	0	96
4、直接引述	6	2	7
5、心情	1	1	1

表四 聲音的對比

	務工者	農民	市民
服務資訊	217	66	555
言論	12	14	153
對話	7	3	108

圖五 不同群體在新聞話語中的聲音對比



不同群體在新聞話語中的地位之不同，是驚人的。為了更直觀的說明這一現象和結論，將不同群體在媒介話語中的言論和對話做一個對比圖(圖五)。可以看到，媒介向市民的開放程度最高，市民在媒介上能夠言說，務工者群體相當有限地微弱言說，但是農民群體幾乎甚麼都沒有說。

分析三：政策類的服務資訊

服務資訊的其他部分裏，有相當一部分是政策的傳達、解讀和具體服務的出台和怎麼利用這些服務。在對待不同群體時，媒體的工作表現在新聞標題上，差異很大。具體說，佐證農民群體看到的資訊無法為我所用，它通常是無效資訊；務工者群體面臨的情況和農民群體一樣，而市民群體能夠從這類新聞資訊中獲得對生活的指導，迅捷採取對過日子有好處的行動。先看媒介針對農民的政策傳達，隨便舉一些新聞標題。：

- 1、減輕農民負擔 蘭州堅決取締不合理收費(新華網，2005年2月1日，16:33)
- 2、朝陽農民可免費轉為城鎮戶口(遼西商報，2005年2月21日，09:30)

3、率先實施農村低保制度試點 保亭特困農民按月領取低保金(海南新聞網，2005年2月21日，09:11)

標題1只能讓人知道政府的決心很大；免費轉城鎮戶口到哪裏去辦，要具備甚麼條件，從標題裏，農民是無法知道的。標題3也只傳達了某個地方政府的「敢為天下先」。總之，這些標題沒有一個是給農民看的，它們的出現不是為了吸引農民，似乎農民不在媒介受眾的考慮範圍之內。

再看三則農民工群體的時政新聞標題。

- 1、平遙：「維權卡」成為農民工「護身符」(工人日報，2005年4月12日，08:25)
- 2、石獅農民工訴訟有了「綠色通道」(搜狐，2005年4月22日，17:24)
- 3、渝中區社區成立農民工服務站(今日重慶，2005年4月12日，16:31)

標題1無法讓人知道維權卡是甚麼部門為民工提供的，標題2所說的綠色通道在哪裏，有甚麼事，打甚麼電話，這成了疑問。標題3也很玄乎，這個服務站能否用上，至少從標題裏看不出來。

從樣本中，再隨便找3則市民群體的新聞標題：

- 1、16838315 市民如有難題「電話律師」幫忙(東南快報，2005年1月12日，11:35)
- 2、市民遇雜訊騷擾可撥「12369」投訴(南方網，2005年4月12日，10:10)
- 3、有小病小痛打個電話問問 市民可撥55571133諮詢新華醫院(搜狐，2005年6月21日，08:32)

這三則標題與上面與農民和農民工有關的服務資訊相比，真所謂開門見山。如果把三則標題按照上面三則的風格和語義重點作改動，變成：

- a. 電信局為市民開通法律服務語音電話
- b. 環保局大力保障市民安靜權
- c. 新華醫院成立市民健康服務站

總之，為甚麼與農民群體密切相關的服務資訊竟然向市民的一樣，做到真正為人所用呢？它們的存在，似乎是書寫權力和這種權力背後的權力的炫耀性展示。

記者想著總理的事？

有一句老話，「記者要想總理的事」。在實務中，也鍛造出了兩句老話：「上掛下聯」，「吃透兩頭」。新聞教材裏仔細解釋說，上掛下聯，即是上掛中央的精神，看黨中央提倡甚麼，宣傳甚麼，反對甚麼，禁止甚麼；下聯當地的實際，有甚麼東西與中央的精神合拍，對中央的調子。吃透兩頭，也就是說吃透上面的精神，吃透當地的民情、社情、市情。這樣才有的放矢，不放「空炮」、「馬後炮」(蔣欽揮，1999)。做到這兩點，作為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樑、紐帶，首先作為黨的喉舌，其次作為人民的喉舌，記者就想了總理的事，不但能想，而且能寫，這是黨報理論的精華所在，也是黨報的傳統。而我們的媒介不論性質如何，都是黨的新聞事業的一部分，都要作到政治家辦報。加上從戰爭年代以來形成和發展的靈活而又穩定的新聞政策，體制加傳統，媒體採取的邏輯往往就是政府的邏輯，地方媒介的邏輯就是地方官員的邏輯。這是與新聞話語的生產和製作聯繫最為直接的語境，新聞主體必須在這一框架中讓社會客體有他們該有的位置。這從社會結構上呼應了在農民在新聞話語裏不是語義重點和注意焦點，而是地方官員、行政部門等，決定了他們和媒介的關係是次要的。從這點來看，記者很難想總理的事。那些來自於會議簡報、工作總結、檔、新聞發佈會的數字和例子堆砌在一起的新聞報導，很難說反映了多少實際，只能說記者的工作在形式上無懈可擊。宣傳的背面是社會的孤獨，到處都是孤獨的自我(彼得斯，2003)。

媒介都是城市媒介，中國城市的發展是犧牲了「剪刀差」上的農村得以進行的。長期的城市中心地位造就了城市的優越感。城市媒介的目標受眾都是城市人，它必須在城市人的態度、看法、價值觀上找到共識。媒介生存的制度空間有限和市場經濟下的商業利益驅動，造就了媒介在新聞話語裏，三類社會群體的講述呈現出不同的邏輯。這是新聞主體在從事新聞的製作時必須考慮的第二個社會語境。新聞主體整體上的話語實踐表現出和農民的關係由此是疏離的和被忽略的。

整體看來缺乏農民階層的聲音的新聞作為一個符號，是傳播過程無法繼續的一個符號。它的符號行為在半途中就中斷了，是一個無效符號，即零符號。它說著農民的事，但是與農民的生活非常遠。作為符

號，它並不在乎它指向了甚麼，即表達了甚麼意義，只在乎它作為符號自身，它的能指出現了沒有。農民階層的新聞話語是一個能指優勢的符號。民工階層的新聞話語總體上也是一個能指優勢的符號。唯有市民階層的新聞話語，在語言行為上，堪稱完成了表意，並且表意和符號的內涵，即所指之間，沒有甚麼偏離。在兩種語境的作用下，一方面，媒介不願意有所作為，不願意就一些社會問題進行思考，而是自覺地執行宣傳任務，另一方面，媒介又必須獲得影響力，捕獲有購買能力的市民獲得廣告收入補貼發行損失。這是中國大陸媒介的生存邏輯，新聞主體在這種邏輯的控制下，在新聞話語中採取了固定的範式。農民階層在新聞話語裏甚麼都沒有說，也沒有被政府及其部門、行政區域和一些企業恰當地談論，是語境規定後的範式的本質。話語被編織到範式中，讀者通過範式輕車熟路地瞭解了媒介所想要傳達的，納入了記憶模式中，形成了刻板成見，形成了文化中的某種傳統，成為了社會機體的一部分繼續生長。

參考文獻

- 丁末 (2006)。〈從博客傳播看中國話語權的再分配——以新浪博客排行榜為個案〉。《同濟大學學報社科版》，第6期，頁53-58。
- 王慧星、李克欽 (2007)。〈話語權的重構——論經濟全球化境遇中的意識形態弱化問題及其對策〉。《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3期，頁4-6。
- 王曉朋 (2006)。〈尊重受眾話語權〉。《新聞前哨》，第2-3期，頁61。
- 王豔平、劉妙妙 (2007)。〈關注基層社會和諧——當前農民「話語權」淺析〉。《農業科技與資訊》，第1期，頁62-64。
- 朱永生 (2003)。〈話語分析五十年：回顧與展望〉。《外國語》，第3期，頁43-50。
- 托伊恩·A·梵·迪克 (2003)。《作為話語的新聞》(曾慶香譯)。北京：華夏。(原書Van Dijk, T.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ove: Erlbaum)
- 李東升、姜曉寧 (2006)。〈互聯網對公眾話語權的影響——一個基於公共領域理論的初步分析〉。《哈爾濱學院學報》，第11期，頁20-23。
- 李彬 (2003)。《符號透視：傳播內容的本體詮釋》。上海：復旦大學。
- 李強 (1993)。《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北京：中國經濟。
- 李敬波 (2007)。〈淺談大眾傳媒之雙刃劍——話語權〉。《新聞寫作》，第11期，頁26-2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四期(2007)

- 李勤、丁潔(2006)。〈新聞傳播環境與話語權的關係探析〉。《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78-83。
- 李瑋慧(2006)。〈從博客看平民話語權〉。《財經界》，第10期，頁197-198。
- 祁林(2003)。〈以BBS為例論網路話語權的有限性〉。《新聞知識》，第11期，頁49-51。
- 祁媛、高劍甯、梁蘭(2006)。〈關於報紙中農民工報導的調查——兼析農民工話語權〉。《新聞知識》，第9期，頁86-88。
- 彼得斯(2003)。《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何道寬譯)。北京：華夏。(原書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n ide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邱澤奇(2004)。《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狀況的變遷》。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 周春霞(2005)。〈論農村弱勢群體的媒介話語權〉。《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150-153。
- 周海濤(2004)。〈農民話語權的表達與傳媒作為〉。《新聞界》，第3期，頁46-47。
- 吳衛華(2006)。〈重塑話語權：網路時代電視媒體的發展策略〉。《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第5期，頁96-100。
- 吳曉明(2004)。〈媒介傳播中的話語權傾向〉。《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89-93。
- 祝敏青(2005)。〈多維言說空間中的話語權〉。《語言文字應用》，第2期，頁73-79。
- 柴靜(2006)。〈話語權的另一半——調查性報導中的平衡原則〉。《電視研究》，第10期，頁49-51。
- 馬慶株主編(1999)。《漢語語法入門》。北京：商務印書館。
- 埃里希·弗羅姆(1987)。《逃避自由》(陳學明譯)。北京：工人。(原書 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陳敏直(2006)。〈西方客觀報導演變與話語權〉。《當代傳播》，第4期，頁32-34。
- 袁三標(2006)。〈從話語權視角看國家意識形態的現代性轉化〉。《理論導刊》，第12期，頁27-29。
- 高榕(2005)。〈試論弱勢群體媒介話語權的維護〉。《安陽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頁150-152。
- 郝澄(2005)。〈西方公共話語權及其在我國的發展〉。《河南社會科學》，第8期，頁102-103。
- 曹國聖(2006)。〈從話語權視角看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走向〉。《理論探討》，第1期，頁73-75。

- 傅俊、韓媛媛(2006)。〈論女性話語權的喪失與復得——解析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說(葛特露的反駁)〉。《當代外國文學》，第3期，頁94-99。
- 張帆(2006)。〈誰剝奪了農民的電視話語權〉。《東南傳播》，第11期，頁33。
- 張明靖(2006)。〈政府新聞發佈與民眾知情權、話語權衝突與協調——以松花江污染事件為例〉。《新聞大學》，第1期，頁111-116。
- 張姍(2006)。〈公共新聞：角色定位與話語權〉。《青年記者》，第4期，頁22-23。
- 張蘭(2006)。〈論BBS話語權與理性使用網路語言的引導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第5期，頁122-123。
- 蔣欽揮(1999)。《新聞角度與選擇》。北京：新華。
- 諾曼·費爾克拉夫(2003)。《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北京：華夏。(原書 Fairclough N. [1992]. *Disours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Polity Press)
- 蜜雪兒·福柯(1998)。《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櫻譯)。北京：三聯書店。(原書 Foucault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 劉志順(2007)。〈女性話語權在廣告中的缺失〉。《今日湖北》理論版，第1期，頁28-30。
- 廖藝萍(2006)。〈農民「話語權」與農村社會和諧〉。《天府新論》，第4期，頁1-5。
- 衛夙瑾(2004)。〈大眾傳媒與農民話語權——從農民工「跳樓秀」談起〉。《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期，頁16-20。
- 魏敏鋼(2006)。〈中國媒介資本的流向及其對弱勢群體話語權影響〉。《聲屏世界》，第11期，頁16-17。
- 譚學純、趙莉(2006)。〈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語言教育對策和話語權〉。《語言文字應用》，第4期，頁20-26。
- 闕祥才、桂勝(2007)。〈新農村建設視野下的農民話語權探析〉。《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37-40。

註釋

1. 百度一下用時0.001秒，搜索日期於2007年6月29日，16:36。
2. 這一總結參見邱澤奇：《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狀況的變遷》(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第二章(頁23-55)和第三章(頁56-69)的內容。
3. 參見鄭杭生、李路路等：《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結構——現狀與趨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李強：《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四期(2007)

4. 筆者嘗試和百度業務部門聯繫，欲瞭解他們和各類新聞媒體和網站的合作規模和媒體的屬性，但是沒有得到對方的電子郵件答覆。

鳴謝

本文寫作過程中，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惠民幫助發展了思路；蘭州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程棟梁博士幫助閱讀初稿。在此致以特別感謝。